

# 民主論壇

第一卷 第七期

這一週

編輯室

誰是分裂世界的責任者？  
傅築夫

從新政府說起

范予遂

從生物學的觀點論戰爭

李正偏

論自由

鄭文海

官

錢寶甫

林繼肩感慨話新疆

丁維棟

為和平團結改革禦侮而

呼籲

胡秋原

不許日人重到台灣(上)

憶琴

(台灣通信)

●逢星期六出版 ●每冊二千元

LIBRARY GENERAL LIBRARY CHINA

# 這一週

## 遠東經濟委員會開幕

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業於七月十六日在上海開幕，他的成敗一時尚不能定，但意義重大却是不容否認的。參加者有十個國家的代表團。我國代表團團長蔣廷黻被推為大會主席。大會的空氣，不算頂融洽，在推舉大會主席的時候，蘇聯首席代表司泰克即表示異議。一連開會了七八天，都是在討論議事章程和聽取聯合國有關機構的報告中過去。工作草案的序言，總算於六月廿四日通過了，而調查的項目，尚待研究中。這樣牛步式的動作，實在令人焦急。該會決定七月十日開全體委員會，討論該會任務與永久地址，蘇聯代表又聲明不參加。這種種，表示各代表還是帶了民族的成見來的，因之就是極小的瑣碎問題，也會浪費時間。其實遠東經委會不過一國際專家機關，有建議權而無決定權，着重的調查與設計的工作，不致損害任何國家的權益。可是在國聯間尚未建立相互信任之前，就是這種消極性的善意供獻，還不容易得到一般國家的接受。

## 張羣提經濟改革方案

行政院張院長因經濟問題日趨嚴重，已提出經濟改革方案，由第五次國務會議討論。方案內容共十五點：(一)發揮人力，增加生產；(二)增產物資；(三)穩定物價；(四)改革金融制度；(五)農業；(六)工業；(七)商業；(八)交通；(九)財政；(十)糧政；(十一)引導游資納入正規；(十二)吸收外國資本，加強生產建設；(十三)合理解決官、兵、公教員工之待遇；(十四)嚴懲以政治力量便利私人企業之行為；(十五)健全經濟組織；可謂包羅萬象，巨細不遺。但是國家行政不比作八股文，說的頭頭是道，就是行的頭頭是道。我們希望方案決定之時，必須週詳考慮，而方案實施之日，必須具有最大的勇氣。國家政策，受政治巨頭的影響不小，故凡妨害巨頭自私自利者，推行起來往往大打折扣。這是吾國政治中最惡劣的現象。政治之所以變成不能行，就為這個道理。這個弊端不加肅清，人民實在怕聽方案了。所有的計劃和方案，原意在約束豪門資本者，結果總是增加了國民的負擔！關於這個事實，張院長不知有什麼一定的政策？

## 新疆北塔山事件

外蒙軍隊入侵北塔山事件，雖未擴大，但仍沒有結束之跡象。蘇聯對我外交當局抗議，已有覆文，否認蘇聯飛機參加軍事行動。外蒙方面，則認

為北塔山係外蒙疆域。在外蒙事件沒有結束之際，孫科副主席連日發表談話，對蘇聯拒絕國軍在大連登陸，而反以此港口移交中共，極表遺憾。國家的處境，在這個時期可謂艱難萬狀。對外的交涉，最好能避免作遠東的火藥庫。

## 內戰

在各方要求和平之空氣中，內戰方態耐進行。東北一區，四平街之戰，膠着星期一星期以上，雙方往復衝殺，死傷之重，為從來所罕見。平津方面，亦呈緊張狀態，因國軍之增援，現已稍見鎮靜。此一星期內兩方彈藥所加於人民之破壞力，實不堪想像。混戰七日，正不知需要若干歲月之努力與建設方能恢復元氣也。雙方偏見，在人民慘痛犧牲之酷烈景象前，希望能有覺悟之可能。抗戰中陣亡者達九百萬，內戰中又不知增加枉死城中多少冤鬼？留下來的生者，為了無法生活，同樣在近於死亡的情形中掙扎！領導人民的人，對於這許多不應該無動於中的。

## 蘇聯接受討論美計劃

蘇聯接受英法之邀請，參加討論美國國務卿馬歇爾之援歐計劃。蘇聯並未提出反建議，甚使英法感覺滿意。預料六月廿七日，三國外長會晤於巴黎，以商談此舉世矚目之計劃。華府方面，對此又疑慮。蓋根據歷來之經驗，認為蘇聯之參與，必使密劃實施計劃時進行遲緩。美國之金元外交政策，在此等場合，顯然遭遇一迷惑與困難。在蘇聯發言之立場中，蘇聯及其衛星國家，均將分有此美金數十億之一部分。

## 日本商務考察團

該團主要任務，將為調查中日兩國間之商業前途。關於中日間銀行運輸保險郵務及電訊之便利，將與日軍總部討論。我人願該團能注意日本商業復員之情形，尤其注意其進出口之狀況。日本雖戰敗國家，大政方針，一一取決於盟軍總部，然年來進步之迅速，遠在我國之上，對於經濟上之措施，極有可以借鏡之處。

## 暑期學生的進修

有因學潮關係，不及舉行考試，即作放假者。抗戰以來，青年時時在動盪中，以至學業方面，荒廢極多。此近三月之假期，應視為進修及考察之最好機會。學期之中，常有學生團體要求遊歷參觀。實則此等活動，極為重要。惟應於假期中進行，一方面可增加活的智識，一方面亦可增進研究興趣。我人既以引導青年自任，則於此等處最不可放棄責任。

# 誰是分裂世界的責任者

傅築夫

一般的講，戰爭乃是人類社會中一種最鉅大的震盪力，它一方面可以加速社會某一部分（包括精神的及物質的）的破壞，另一方面又可以加速社會某一部分的建立。這不是說現戰爭是人類文化的搖籃，而是說戰爭是歷史演變的轉捩點。此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一次空前的大戰，同時也應當發生歷史上空前所未有的變革。大戰以後，不僅應當改革舊有的制度，而尤當徹底改革人類的思想，使戰後的世界不是舊時代的延續，而是新時代的誕生，至少也應當接受本身所受的教訓，不再蹈錯誤的覆轍。否則人類的血將等於白流，而歷史將要重演。

當大戰尚在進行，尤其是當德日兇殘方張，東西戰局異常黯淡之日，同盟國家，尤其是中美英蘇法五大盟邦，或者已經飽嘗到亡國的慘痛，或者抵抗得力竭聲嘶，或者在趕造軍備，或者在苦熬時間，這時每一國家都感覺到戰爭的殘酷，感覺到必須澈底合作，以規避戰爭的因素，而確保世界的永久和平。所以不待戰事結束，不等勝利到來，便於漫天烽火之中，檢討第一次大戰後的失敗教訓，於爭取戰爭勝利的進程中，同時便都苦心焦慮的壁劃着未來的世界和平。痛未定而思痛，顯然是這一次戰爭中很大的進步。像故羅斯福總統所領導的各種國際會議，和所要建立的戰後世界和平機構，固然是戰時的重大事件，然而尤為重要的，是各強國都準備放棄權力政治的企圖，用以掃除建立世界和平機構的障礙，其中特別重要而應當大書特書的是：（一）大西洋憲章的宣佈，根絕了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間的對立，而保障了各國家各民族政治的和經濟的自由；（二）英國放棄了均勢政策，根絕了在歐洲大陸上時而扶甲倒乙，時而扶乙倒甲的傳統政策，決心要建立有效的集體安全制度，以剷除歐洲的戰爭威脅；（三）蘇聯聲明取消第三國際，登時撲滅了世界革命的烽火，根絕了同盟國間的互相猜忌，表明社會主義的蘇聯，將與資本主義的英美，共同担負保障和平

的責任。在這樣一種樂觀的氣氛之中，誰不對於戰後的世界和平抱着絕大的希望？

不料戰爭的餘燼未息，瘡痍未平，而世界的風雲即已突變，一時東歐問題，中東問題，海峽問題，希臘問題，義南疆界問題，蘇土領土問題，伊朗撤兵問題，中國東北問題，朝鮮獨立問題，日本佔領問題，及殖民地託管問題，諸如此類，都一一的成爲列強尤其美蘇間的鬥爭題目。雙方不僅在國際會議上，舌槍唇劍，爭吵得面紅耳赤，並且在實際上都加緊的擴張軍備，以準備分割這個殘破的世界。於是一方面在樹立不可逾越的「鐵幕」，繼續不斷的擴張「安全帶」，另一方面則在組織西歐集團，實施世界規模的「杜魯門主義」，用以形成一個反共的十字軍。結果，昔日併肩作戰的盟友，現在都儼然變成了敵國，而過去的共同敵人，現在反因了時勢的推演變化而成了雙方爭求的與國。國際間既完全爲這種反動的逆流所瀰漫，遂使一切爲締造世界永久和平的努力都歸於失敗。不特聯合國機構成了空洞的軀殼，而一切國際會議亦都變成了權力政治的搏鬥場。其後莫斯科四外長會議的失敗，更說明了國際間的緊張關係業已無法和緩，而美蘇間的尖銳對立已經成了定局。現在大家所苦心壁劃的，已經不是和平如何建立，而是另一次的戰爭如何預防或如何準備。早在幾個月以前，美國名政論家李普曼即於其考察歐洲的通訊中下了一個肯定的結論，謂：「全歐洲各國之政府，各黨派，及全體領袖人物之行動，皆宛然另一戰爭即將來臨。」年來「第三次大戰」問題，所以成爲全世界各處人們的街談巷議，實非偶然。

這種局勢的造成，無疑的蘇聯是站在一個主動的地位。因爲在英美蘇三個鬥爭的主角當中，第一，英國不但沒有威脅別國發動戰爭的意願，而且也根本沒有這樣的能力。第一次大戰以後，大英帝國即已開始走了下坡

路，她不但沒有擴張領土野心，甚至連保守她已有的家當，也都深感不易，張伯倫之所以採取綏靖政策，並不是由於他錯估希特勒，而實是英國國力衰退所使然。經過了這一次大戰，英帝國的國際地位實際上業已一落千丈，六年大戰，僅免覆滅，雖在美國的大量援助之下得以重整家園，然至今瘡痍未復，困難重重，自顧尚且不暇，更何有餘力去製造糾紛？尤其是英國的領土，散漫在世界各處，任何一個地方發生糾紛，都可以影響到英國的利益。所以英國之需要和平，英國之希望透過聯合國一類的集體安全制度以確保世界的安寧秩序，實與其他飽經戰禍的國家為同樣迫切。因此我們可以相信英國之呼籲和平與厭惡戰爭，都是百分之百的誠意。其次，我們再看美國：杜魯門總統曾一再的對世界聲明：『另一次世界大戰將粉碎人類的希望，並完全毀滅吾人所知之文明。吾人外交政策之要旨，為誠意希望和平，吾人願以符合自由與安全原則之方法，決心為和平而工作』。前國務卿貝爾納斯亦屢次於廣播詞中，保證美國決不向任何國家尋釁，也不準備與任何國家作戰，且曾坦白說明：『美蘇間尋求同情與諒解的發展，是政治家的至上任務』。我們不妨就根據美國當局所聲明的根本原則，來檢討一下美蘇關係的發展，看看他們的言行是否一致。盡人皆知，美國人民不是一個好戰的民族，也從來沒有割裂過別人的領土，或掠奪過別人的資財，過去為了避免牽涉入國際糾紛，曾經長時期在門羅主義孤立主義之下而不問外事，後來中立法的嚴格限制，更使美國對世界許多問題都無法插足。如果不是日本愚蠢的去偷襲珍珠港，美國是否參戰及以何種方式參戰實大成疑問。在二次大戰中，無疑的美國是抗拒純粹的主力，當蘇聯節節敗退，德軍長驅直入，而兵臨莫斯科近郊之日，美國不顧一切，曾以全力赴援，如果沒有美國的大量援助，則今日之蘇聯究竟是誰家之天下？這些事實足以證明美國並不是先天的反蘇，當大戰尚在進行之日，史達林曾聲明取消第三國際，以剷除同盟國合作的障礙，因此，美國更是死心塌地的悉力援助，羅斯福總統亦才以十足的信心去籌劃戰後的和平機構，總以為在三強或四強的密切合作之下，世界的永久和平是絕無問題的。不料勝利的端倪甫露，蘇聯的態度便馬上改變，雅爾達會議開了第一炮，首先壓迫羅斯福以犧牲中國，而羅斯福總統便在一種和平的幻想之下，以不合理的重大代價，去換取了蘇聯口頭允許的和平，羅氏也就因此鬱鬱而

死。羅氏逝世以後，蘇聯的要求更是一步緊一步的逼來，而美英為了獲得蘇聯的協調與合作，也就一步退一步的忍讓。由波茨坦會議到前次莫斯科三外長會議，都是這個忍讓政策的事實表現。在波茨坦會議中，美英是極力的遷就蘇聯，答應蘇聯佔領德國最富庶的區域，兩國不但承認蘇聯有權遷移其在德國佔領區域內的物資，並且還承認蘇聯可自英美在德國佔領區域內獲得賠償，而英美則聲明放棄自德國的蘇聯佔領區域內，以及德國在保加利亞，芬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奧地利東部的資產內取得賠償之權。關於波蘭政府問題，美英答應了蘇聯的要求，取消對於倫敦波蘭流亡政府的承認，按照蘇聯意向另組波蘭臨時政府。關於奧國的臨時政府，美英也讓步接受蘇聯的建議，擴大此臨時政府的權限而至奧國全境。關於蘇聯毗鄰波羅的海之西部邊疆，美英又承認將德國的哥尼斯堡城割給蘇聯。關於羅、保、匈、芬等國，美英也承認於擬議設立的五外長會議中，準備與各該國的「民主政府」締結和約。總之，蘇聯今在歐洲的特殊地位，顯然都是在美英的共同讓步之下建立的，這都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就是蘇聯自己也不能不承認。

美英雖這樣一再，再而三的對蘇聯忍讓，而蘇聯則得寸進尺的逼來，例如她囊括了全部東歐以後，便首先樹立起對抗美英的「鐵幕」把歐洲分裂成兩半，從波羅的海，直達亞得利亞海，並且還要穿過地中海而達北非。另一方面則四面八方的擴張其「安全帶」。在延伸這種安全帶的進程中，有許多別國的領土竟直接的被吞併，例如：芬蘭北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里蘇埃尼亞，東普魯士北部，波蘭東部，捷克東部，羅馬尼亞之比薩拉比亞及布哥維亞兩省，丹奴士華，中國之旅順港（實際上已包括大連），庫頁島南部，千島羣島等，其未能立即吞併而以各種方式加以控制的，計有波蘭，德國東部，捷克，奧國東部，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在亞洲方面有外蒙古，新疆之一部，朝鮮北部等。麥克阿瑟將軍亦曾於去年日本投降紀念日發表聲明，公開指謫蘇聯在亞洲進行其「統制或毀滅」政策，並與西方民主國家從事一種「不宣之戰」。這都是過去二年多的經過事實，非任何人可以捏造，也非任何人所能否認。

雙方的關係如此，世界和平如何能不受威脅？英國以首當其衝，尤感

切膚之痛，故邱吉爾到處呼喊說「任何人亦不知蘇聯及其共產國際組織，在最近期內意欲何為，彼等之擴展及變革傾向如何有限度，其限度為何，亦無人得知」，貝文亦說：「大國的擴展已經刺入英帝國的咽喉，我們實已無法忍受」。威脅了英國，同時亦就是威脅了美國，因為美國的世界利益現在已遠駕英國之上，蘇聯的擴張政策不僅妨害了美國的經濟利益與政治的地位，而且還威脅了美國人的民主的生活方式。莫洛托夫曾經公開說過：「英美的民主觀念乃十九世紀之遺物，此種觀念雖較當時專制政體略勝一籌，但此時已臨二十世紀，亟宜採取一種徹底現代化之民主政治，如蘇聯所締造者然。蘇聯的政治不但適用於蘇聯本國，而且可適用於其他國家」。可見雙方的衝突不僅是一個權力的爭奪問題，而且是一個思想的鬥爭問題，蘇聯所要求的「安全」，很顯然並不是單純從地理上滿足國防的需要，而是要在思想上使天下「定於一」。蓋認為世界上只要有非蘇聯式的思想及制度存在，便是對蘇聯本身的安全與世界和平一種極大的危險。

蘇聯外交政策的基本目的，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在要求和平，尤其是爲了恐懼戰爭而要求安全的保障，如一般人所代爲解釋者。但即使是如此，而原則與政策之間也發生了一個極大的矛盾。因爲過度的安全感和猜疑心使她不肯從聯合國的世界機構中去覓取和平與合作，而要趁世界動盪不定之秋，無限制的去擴展自己的安全帶和勢力範圍，並且要以自己所信奉的政治哲學去造成蘇聯式的天下一家，甚至還採取了「統治或毀滅」政策，或直接的吞併，佔領，或間接的利用各國共產黨以製糾紛，推翻原有政權而建立其所謂友好政府。這樣一來，不但首當其衝的國家是人人自危，就是美英等強國也不能不爲本身的安全起而自衛。於是便面對着東歐鐵幕，而有了西歐集團，面對着思想的政治的軍事的鬥爭，而加緊作萬一的準備，結果，遂由國際會議席上唇槍舌劍，進而變爲大規模的整軍經武。雙方面既已磨刀霍霍，戰爭的謠言和恐懼如何能不瀰漫各地？所以我們即使絕對承認蘇聯的目的是和平，然而她的方法却適得其反的在製造戰爭，亦可以說蘇聯是爲了恐懼戰爭而製造了戰爭，因爲爲了自己的安全而犧牲別人的安全，結果便是戰爭而不是和平，杜魯門總統曾在聯合國大會上明言：「各國人民不但必須以和平爲一種理想，而且必須遵循法律與公理之原則。故每一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中，必不可威脅或運用武力，以破壞任何

一國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又說：「唯有尊重各國合法利益之國際合作及睦鄰之行動，始能促使吾人獲致廓清戰爭氣氛之協定，任何一國均不能單獨獲致；盟國間之長期協定，亦不能以犧牲任何國家之安全獨立或領土完整之代價獲致之」這些話顯然都是對蘇聯而發，而蘇聯顯然就違背了這一原則。但是這一個原則正是聯合國所賴以建立的基礎，且載於聯合國憲章第二條之中。蘇聯在行動上破壞了聯合國憲章，而只是在口頭上作空洞的擁護論，世界的持久和平絕不是由這種外交辭令所能獲致的。

總之，由上述美蘇關係演變的經過，便可知誰是分裂世界的責任者，不管大家在主觀上是不是居心在製造戰爭，然而這種錯誤的政策如不徹底改變，其結果遲早會逼成戰爭的爆發。最近貝爾納斯於接受國際萬有俱樂部人道獎章時（五月十八日）發表演說謂：「現在美國與蘇聯人士關於戰爭之說很多，關於和平之說却很少。（中略）蘇聯人民不需要戰爭，美國人民當然也不需要戰爭，在這種情形下，倘若戰爭爆發，當然非因人民之要求，而係控制政府之人無能」。我們不承認第三次大戰爲不可避免的說法，但是我們却不能不要求盟國當局，要珍重本身所受的血的教訓，及早變更政策，消滅戰爭的因素，萬勿踏着血腥的覆轍作希特勒命運的繼承人。

# 大華貿易行

經營國內外進出口及運輸業務

地址 四川南路一號

電話 八七九〇一

分公司

香港 天津 青島

國內電報掛號 〇五六一

國際電報掛號 TSUANWU

# 從新政府說起

范予遂

## 一「行政院負責制」怎解？

若是包括各黨各派及社會賢達共同負責的國民政府，不能把它所公布的施政方針，一一見之於實行，則這個政府，將被人民視為換湯不換藥的政府，必使全國人民失望。

施政方針第五條，強調「提前試行行政院負責制」，表面上似乎很冠冕堂皇，實際上則不容易行得通。所謂「行政院負責」第一是行政院有行使政權的全權，第二是對立法院負責。現在的制度，行政院之上有國民政府委員會。依照國民政府組織法第十六條，「國民政府委員會為國民政府之最高國務機關」，國民政府施政方針第五條「行政院應依國民政府之決策，負執行之全責，以符合於有權有責之原則」。因是，行政院乃為執行國民政府委員會決策之機關，而非自己決策自己執行之機關，換句話說，行政院乃為有責無權之機關。這樣，行政權實際不屬於行政院而屬於國民政府委員會，行政院也就不可能有行使政權的全權了。

至於對立法院負責，更說不上。現在的立法委員，是由政府委任的，是官吏而非人民代表。他們既無進退行政院長及政務委員之權，也沒有變更或否決行政院政策之權，行政院也就無從對立法院負責。現在的制度，實際是國民政府主席負責，不是行政院負責。因是，施政方針第五條所謂「根據憲法規定之精神，提前試行行政院負責制」這句話，是自欺而不以為自欺，欺人而欺不了人的文字掉弄而已。試看六月四日行政院會議，有政務委員嚴詞質問各地軍警當局大捕學生，出於何人命令，院長幾不能作答，則知行政院連執行之責，亦受侵越，此種「行政院負責制」真是史無前例啊！

我以為這種原則與事實相矛盾的制度，必須加以糾正，否則行政院就不能稱為「國民政府行政最高機關」。但現在的政府是過渡政府，在此過

渡時期既不便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或取消國民政府委員會，或明定主席不負責實際政治責任，則祇有在現行制度之下，對於現行制度善為運用，如運用得好，則「行政院負責制」這個原則，即不能作到百分之百，亦可作到近於百分之百。補救之道：（一）國務會議重要提案，在提出國務會議之前，應先商得行政院長之同意，凡行政院長及兼任國府委員之政務委員，認為絕對不可行之提案，國務會議不能憑多數決議強迫行政院執行；（二）執行之責，絕對屬於行政院，國民政府主席除依法發布命令外，不以個人手諭或私電，直接命令行政院所屬任何機關，執行任何任務；（三）承認立法院之立法全權；（a）立法案經立法院覆議而仍維持原案時，國民政府即不得變更之，（b）國民政府不經立法院不得自製法律公布實行。惟有照此作去，「行政院負責制」這句話，才不至於完全落空。

## 二 與保障人自由相矛盾的「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

新政府與舊政府不同。第一，它是準備行憲的政府，因此，凡與憲法精神相抵觸的事，它就不應該作。第二，參加政府的人，都是中外知名的所謂自由分子，既是自由分子，就不能一上台便變為反自由的分子。國民政府為鎮壓學潮於五月十八日頒布了所謂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六項，真出乎人們的意想之外。

學潮發於大學生，大學生是對於政治最敏感者。聰明的政府，應以學潮為鏡，用以照視自己的得失，知所警惕，不應視學生如大敵。大學生富有理智與判斷力，然亦富於感情，且多人聚集而為羣衆行動，更難免感情用事。五月十六十七兩日首都及自滬來首都各大學生在教育部及行政院所為，如打破窗玻璃，吃光他人之飯，胡亂塗寫及任意譏侮首長等，以法律觀點言之，誹謗罪，擾亂秩序罪，侵害罪等，都可加得上。以教育觀點言

之，乃感情之率真的發洩，可以加以原諒。以政治觀點言之，乃青年對於政治不滿之反應，政府絕不能視此種舉動，是學生大陰謀的預告。政府惟一平息學潮的方法，是推求學潮發生之原因背景及學生不平之由何而來，從而疏導以除去之，對於學生要求抗議之合理者，迅速的答應，不合理或合理而為事實所不許者，亦坦白的告訴他們，另一方面，則責成校長教授及其家長及社會輿論，勸導他們，則學生絕無不聽從之理。若政府接受合理要求並盡了一切疏導勸解之力，而學生仍不折服時，再假定學生中少數有意鼓動風潮，擾亂社會秩序，藉助於軍警之力不逞。且軍警力量亦必待學生作出擾亂社會秩序之行爲時，始能使用，若學生僅排隊游行示威，而不作出破壞或擾亂行爲時，軍警祇有隨行保護，斷無干涉或阻止游行之理。國民政府對於京滬等地學潮，事先既忽於疏導，事後又過於張惶，乃輕於引用施政方針第十條後半段「其因維持社會秩序，避免緊急危難，而必須予以限制者，其法律應由國民政府委員會通過之」之規定，冒然通過了這個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而將同條前半段「嚴格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嚴禁非法之逮捕與干涉」之規定，輕輕給一筆勾銷。我們真爲自由分子組成的，象徵着自由與民主的國民政府大爲惋惜。

我曾批評五五憲章第四十四條爲危險條文，主張不定於憲法，不幸國民大會制定之憲法第四十三條，在立法院休會期間，仍給總統以緊急處分之權，構成了董必武先生攻擊中華民國憲法的一個理由。就現在的政府輕於施行緊急權觀之，則將來的民選政府，對於憲法之行使，我就很擔心。恐怕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三條要蹈德國魏瑪憲法第四十八條的覆轍。德國魏瑪憲法，到了希特勒之手，只有四十八條爲他所願意遵守了。

我以愛護新政府的見地，誠懇希望新政府迅將這個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取消。這個辦法既稱爲臨時，且是特用以應付六月二日各地學潮的，今六月二日已經過去，各地學潮亦大致平息，則取消這個辦法，此正其時。同時，我更希望政府迅將施政方針第十條後半段刪去。此後政府萬萬不可輕於施行緊急權，即萬不得已而必須施行，立法院既可隨時開會，緊急法律亦必須先交立法院通過。今國民政府不經立法院通過手續隨意制定並施行限制人民自由之法律，實在是違反憲法精神，也與所謂行政院對立

法院負責之精神背道而馳。今後的政府及主持政府的人，千萬不要再說的是一套，行的又是一套，下了台是一套，上了台又是一套了。國民黨二十年來的兩套政策，活活的害了自己，害了中國。

### 三 何時實現「以政治方法謀取國內之和平統一」

新政府最大而惟一的任務，是施政方針第四條所謂「以政治方法謀取國內之和平統一」。這個任務若達不到，則這個施政方針將完全落空，這個政府也就完全失敗。

這個新政府是過渡政府，是「由參加之各黨派及社會賢達共同負責完成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之政府。憲法施行日期，國民大會通過爲三十六年十二月廿五日。憲法實施準備程序，亦爲國民大會所通過，自三十六年一月一日公布憲法之日期起，三個月內制定各種選舉法，再六個月內完成各種選舉。故此過渡政府之壽命，最長至本年十二月廿五日爲止。自現在算起，祇有六個月又半。依照施政方針第四條，恢復和談之前提條件，是「鐵路交通完全恢復」，不管是政府以武力恢復或共產黨自動恢復。但照現在的局勢，在這六個月又半之內，共產黨未必自願恢復，政府也未必能以兵力恢復。即能如期恢復，共產黨是否願在武力壓迫條件下言和，也還有問題。那麼，政府「以政治方法謀取國內之和平統一」這個方針，豈不等於一張不能兌現的支票嗎？所以，政府處此困境，應拿出最高智慧，以考慮這個有關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不應意氣用事到底。國民參政會提出的和平方案，希望雙方無條件恢復和談，實是打開國共僵局最合理公允的主張。我以爲不管共產黨對於這個建議的反應如何不好，在政府則應首先誠意接受。

國民黨一部份人過度害怕共產黨的心理，給和平以不少阻礙。他們以爲如果國民黨允許共產黨參加聯合政府，則國民黨必變爲克倫斯基。我爲中國無列寧，也就不能有克倫斯基。以三民主義的信徒而自怕成爲克倫斯基，這是何等胆怯，氣餒，失掉自信力的心理。國民黨不欲自救，起死回生則已，如欲自救，則必先打破這種恐共心理始。這種恐共心理之由來，表面上是反對共產黨之殘暴及武力奪取政權，實際上是反對民生主義

的共產主義，反對打破社會特權階級。國民黨一部份人，已造成了自己的特權階級地位，根本不顧自動放棄，這是實情。馬歇爾將軍謂「國民黨不妥協分子，意欲保持其自身對中國之封建控制，顯無實行行政協決議之誠意」，可謂誅心之論。

共產黨抱有奪取國民黨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企圖，誰也不能否認。但它有此企圖是一問題，它能否達到此企圖，又是一問題。項羽見秦始皇過，曰可取而代之，設使秦始皇不為暴政，造成天怒人怨之局，則項羽之野心，根本無從實現。共產黨在中國之長大，是國民黨二十年執政，製造少數特權階級，維護少數特權階級之必然的結果。所以國民黨要與共產黨實和，不是共產黨有無放棄武力奪取政權的誠意的問題，而是國民黨有無自願放棄自己的特權地位的決心的問題。就近幾年來國民黨內部的開明份子之猛烈攻擊貪污與官僚資本言之，可知國民黨的開明份子不是沒有放

# 從生物學的觀點論戰爭

李正偏

## (一) 生物界戰爭的目標

在生物界戰爭是普遍的現象，但多發生於異種之間，在同種間很少有規模戰爭的。戰爭的目標，則為保持種族的生存。例如致病細菌與高等動物戰鬥，病原菌侵入動物(宿主)體內，生存繁殖，對於病菌本身有利，對宿主則有害。病菌在宿主體內繁殖，雖於己有益，但為保持病菌有利形勢的長久起見，最好使宿主繼續生存，以免因宿主死亡而同歸於盡。故為病菌打算，最善的戰術，為與宿主保持均勢作用，不將宿主立刻殺死。由此可以說明生物戰爭的目標是維持種族的生存。人類都是同種，本應互助而無戰爭，自相殘殺乃最不利的事。萬不得已而發生戰爭，其目標當為求本集團的生存，而不是一時意氣之爭。曾聽人說一個故事，台灣土著痛恨日人，其次土著男子外出殺敵時，番女跪於丈夫前面自殺，以鼓勵乃夫拚命殺敵，無所後顧。這樣做法精神雖然值得欽佩，但戰術卻甚愚笨。因為這樣做法即使獲勝，種族仍不能生存。當第一次歐戰西方戰事緊急時，德

棄特權階級地位之意向，然就政府對於貪污與官僚資本之猖獗，畏首畏尾，不敢加以斷然處置言之，又可知國民黨政權實已為貪污之網與官僚資本之網所緊緊包圍，大有掙扎不脫之勢。所以，國民黨自身最迫切的問題，是如何以快刀斬亂麻的非常手段，迅速解脫出這兩層密網的束縛。國民黨如能脫出這兩層密網的束縛，也自然就不會留戀這個特權階級地位，也就沒有懼怕共產黨的心理了。這時的中國共產黨也不得不收拾起它的奪取政權的野心，與美國共產黨英國共產黨一樣的與其政府和平相處了。

局勢太嚴重了，國家早一日獲致和平，國家脫免將來更大危難的機會越多。我誠懇希望新政府以最大決心，勇氣與誠意，不惜任何代價，以實現中國之和平統一。中國將來的國難是否能以避免，就繫於施政方針第四條的成敗呵！

國與登堡元帥，下令士兵輪流回家休息六個月，以後方新兵大量補充。這是很困難並且危險的舉措，但他不顧許多人的反對，毅然執行。第二次大戰時，方知與登堡的用意所在。因希特拉所驅使的壯丁，都是上次歐戰時與登堡命令休假士兵所生的小孩。若當初嚴禁兵士休假，後方女子守寡，生殖率減低，第二次大戰便會感到壯丁的缺乏了。

## (二) 決定勝負的生物因素

生物界兩個集團發生鬥爭時，集團組成分子的量與質都是決定勝負的因素。質的優劣，可以用人為的方法來控制。例如有二試管各盛十萬個傷寒桿菌，每管中有一萬個為毒力極強者，二管的一切環境相等，並無軒輊。若於最初接種時，將甲管的一萬個毒菌殺死九千個，乙管則否，經過若干代以後，因遺傳的結果甲管毒菌比例便減少，乙管毒菌則仍維持原形，二管的毒力總比較便大不相同了。人類亦如此。關於人類品質的問題，有二個因素，就是體力強弱及智力優劣，二者由遺傳與環境而決定。所



以在國防上說，應維持國民體力智力的水準，並促使進步，特別注重優秀分子，使有生存繁殖的機會。

從歷史上看，漢初，東亞有兩大民族鬥爭，即漢與匈奴。漢族係秦併六國後混合而成，為農業民族，體力不及匈奴。匈奴為遊牧民族，擅長騎馬射術之術。故以漢高之英勇尚被匈奴所困。但漢人智力超進匈奴，戰爭最後結果為漢朝勝利，漢武帝以後匈奴便大失敗了。

五胡亂華時，各族血統加入中國，及至隋唐統一南北朝，中國形成混合民族，體力智力均佳。唐高祖時，突厥引兵入侵，召開軍事會議，磋商對策。秦王李世民，主張率兵攻打。元吉反對說，秦王可殺。大意謂從前樊噲誇口率兵十萬，即可橫行匈奴，陳平却謂樊噲可殺，因高皇帝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尚且被困，何況今日。李世民反駁說，昔日漢弱匈奴強，如今我強而敵弱，雙方情勢顯然不同，樊噲小子何足道哉。我認爲在中國歷史上，李世民間勝決定勝負的生物因素。漢朝出兵打匈奴時，常有漢兵多而匈奴兵少，漢兵數名才抵得住一匈奴兵。唐時出兵打突厥則唐兵少而突厥兵多，唐兵一名可打數人。至於智力，也是漢人好。唐太宗命李靖教導侯君集學習兵法，侯有一次對太宗控告李欲造反，因爲李留最好一部分不肯公開教授。太宗便責問李靖。李說這是侯君集自己想造反，並非我要造反，如今中國本部無事，僅邊境不寧，我所教的兵法對付夷狄已足有餘，若侯非別有用心，何必要我教他兵法的精華之部，可見漢人的智力戰勝夷狄綽有餘裕。

宋朝時候，乃漢族衰落之秋，體力智力皆不及蒙古人。蒙古開國時代將帥的天才是不能否認的。近來許多歐洲學者，研究蒙古人能征服歐亞，並非偶然，諸如作戰策略，組織方法，偵探技巧，運輸步驟等皆超過當時其餘民族。例如攻打大理時採取大包抄迂迴戰術，秘密繞至大理南邊，大理才發覺，措手不及，致毫無抵抗餘地，實在精巧之至。

明末清初，建州民族的智力體力皆佳，實非暮氣沉沉的漢族所能比擬。袁崇煥很能瞭解此種生物因素，主張以遼制遼，部下將士多爲滿人，此法頗屬成功，不幸明政府將其殺死，使其戰略不能貫徹，明帝因以滅亡。

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戰略錯誤，殺滅並驅逐猶太人，使許多猶太科學家，無法駐足德境。有一猶人到英國，向英方建議設計並組織一航空隊

，炸毀德國湖堤，湖水泛濫，造成大災。這種例子，尙不過是一時的損失，而更有將來的危險。因爲今後是科學戰爭時代，科學上發明，原理在先，應用在後，普通在理論發明後四五十年才達到應用的地步。德國第一流科學家中有許多是猶太人，均遭受驅逐，四五十年後，科學理論空泛，科學發展將大成問題。又如飛機師，須體格智力均佳的人，才能充任，可算是民族中的優秀份子。德國大批犧牲飛機師，亦未始不是一種值得憂慮的現象。此次大戰，日本在中途島之役，犧牲其大部的優良空軍人員，以後日本空軍便一蹶不振，這也是日本失敗原因之一。

### (三)目前國防上的危機

目前的中華民族，從理論上說，是一個向上發展的民族（理由見拙作從生物學觀察中國之前途，載本年五月七日大剛報）但是也有許多人爲的弱點。從量的方面來說，號稱四萬萬人口，而質的問題却很嚴重。因爲人類自十八歲到五十歲是能力最強的階段，不幸中國同印度相仿，壯丁比較很少。印度人口雖多，但多數在十五歲以下，中國亦以小孩佔多數。例如一家有二兄弟，各生八孩，共有二十人丁，三年後人丁數目並無增減，七八歲小孩死亡四人，兩男生一二歲小孩四人補充。生來生去還是小孩，生殖率高，死亡率亦不低，達成年者爲數實少，即使勉強達成年，多非壯丁而爲瘦丁，營養不良，疾病流行，兵役大成問題，不易抽到壯丁。美國人口爲一萬六千萬，而能出兵一千一百萬，中國雖有四萬萬人口，兩抗戰時士兵數目實際最多不過三四百萬，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仍抽不到合格壯丁，所抽的體弱不堪，風吹可倒。曾見送往昆明受美式訓練的壯丁，一千人中，只有數十名體格勉稱及格。寶貴的壯丁，既如此之少，若不加愛護，而隨便犧牲實爲國防上的大危機。

至於智力問題更值得注意。歐美政府有計劃維護知識分子，社會制度無形中有利於知識分子。中國則相反，公教人員待遇過菲薄生活艱難，復被迫節制生育，既生者營養惡劣，疾病叢生，障礙體格及智力的發展。此外左傾右傾者流互相殘殺損失不可勝計。我們要知道思想及見解，並非由遺傳而來，可設法領導使入常軌，不宜推殘，使民族智力降低，形成未來國防上的重大危機。

以上各點都是根據真理與事實的實情，至於怎樣補救，來充實我國國防，則擬另文討論，本篇姑不多述。

# 論自由

鄒文海

自由與不自由，在老百姓總是很容易辨別的兩種不同的境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與哉」的古代人，我們不會說他不自由的。反過來說，宋江被張順強迫要作「板刀麵」的時候，我們又沒有一個人會說他自由的。悠悠然與惶惶然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心境，宛如南轅北轍，絕不容許混為一談。然而作官府的人，往往是自說自話的，明明已迫得你惶惶然了，還說你是最自由的。在這種時候，一般人對於自由的意義實在要不明不白的了。

自由是什麼人都要求的。讀書的願意自由地讀他們的書，種地的願意自由地耕他們的地，做工的願意自由地做他們的工，經商的願意自由地做他們的生意。各人對於他的生活都有個打算，這個打算，聰明人亦許說是優的，但無關宏旨，各人總是希望這種打算能如願以償。讀書的某甲打算十年寒窗一舉成名，耕地的某乙打算飼養一條小黃牛以替代他勞動，做工的某丙打算學好一點手藝，經商的某丁打算自己有一個店舖。平凡的人打算就是這樣平凡的。但這種打算因為受到人家的打擊阻撓而沒有能成功，有這種打算的人一定怨恨氣憤，而這個怨恨氣憤就是不自由感覺的表現。

好多的學者把自由講得玄之又玄。尤其盧梭和康德的長篇大論，使我們往往不得要領。他們把自由看得太神聖了，以為這是靈魂高度發展以後才能發現的境界。由是他們的自由往往與實際生活脫離了線索。其實任何一個平凡的人，他們都總有對於自由的想法。亦許他不稱這個看法為自由，那也是無所謂的。比如說有的人稱自由為「稱心」，有的人稱自由為「如願」，雖然說法不一樣，而確實表現平凡人自由的觀念，而這種平凡人自由的觀念，都是與實際生活有關，而且也能為每一個平凡人所了解。「

稱心」「如願」，就是一個人生活上的打算能順利地達到目的，這也就是學者所頌揚的自由。為什麼平凡人的平凡打算，有時不能「稱心」「如願」，而令人有不自由的感覺呢？在大多數的情形之中，不良的政治設施實為其原因。這個說法，愈到近代愈見其確實。在從前，學校是私塾，先生都是家長請的，自己讀不好書，決怨不到國家。種地的更是在「自然社會」之中，很少受到法律的支配，所以也很少可以怨到官府。做工的與經商的，情形大抵相同。自從近代國家的形式成立以後，一切都經到官府，無論那個窮鄉僻壤，都可以看到官府的告示。官府規定這個規定那個，所有的規定都與平凡人的生活有關有影響。規定得合理周到，大家生活上的打算有把握容易達到目的；規定得不合理不周到，大家生活上的打算就無把握不容易達到目的。因此，現代的所謂自由與不自由，大部分是政府的行政以及法令所造成的。學校裏沒有好的設備沒有好的教師，想讀書的得不到實在的學問，所以青年苦悶；想教書的得不到教書的工具，所以教師苦悶；耕地的牛被屠宰了，兒子抽壯丁抽去了，眼看田要荒蕪家要衰落，所以農夫苦悶；做工的得不到按照生活指數的工資，養不活一家的父母妻

子，所以工人苦悶；經商的經不起左一重稅右一重捐，更兼法幣跌價，貨賣出去後買不進同樣的東西回來，所以商人也苦悶。這種種苦悶，都因為生活上的打算打了折扣甚至成了泡影。而這種種生活上的打算所以要打折扣要成爲泡影，又大部分是政府的行政與法令所造成的。

賴斯基說自由是生活的一個條件，也是種實在在的說法，與平凡人的觀點頗爲接近。可是話要說回來了，究竟怎樣使大家的自由得到保障？近一二百年思想家的研究，政治家的努力，對這個問題總算有了個答

案。

關於自由的保障，歷來採取兩種不同的方式。第一是在憲法中規定人民的基本權利，而此等權利為政府權力所不得侵犯者。第二是規定政府民選，使政府的利益能與人民一致。這兩種方法是否有效，姑不具論，但我國還沒有實行更沒實現這兩項原則，那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人民權利，幾次想肯定的規定下來，但因為政府祇顧到自己的方便，並沒有履行諾言。最明顯的例子，如報紙之被封禁，學生的被槍殺，雖在行憲之年，仍不能免。其餘如官吏越權，動輒損害人民的利益，更是呼天無應，訴願無門。除非是專門滑吏，幾乎沒有一個人有自保之道。那一個人在投宿逆旅的時候能避免檢查，我們有什麼行動的自由？那一個人在講話的時候不要提防隔牆有耳，我們有什麼言論自由？那一個人的財產不會有變相被沒收的危險，我們有什麼財產的權利？那一個人的生命不受屠夫的捉弄，我們有什麼生命的權利？講到政府民選，更是空口說白話，連所謂民意機關都不是由選舉產生的。衙門中的官僚習氣，從沒有因民主這兩個字而稍有改變。不要說衙門中的官僚，就是保甲長之流，也一個個如狼如虎，絕不能為人民權利着想。一般國家對於自由保障的兩種方法，在我們看是一樣都沒有實現。

小穆勒於討論自由之際，曾經發問過一個問題，那就是「民主政府真正實現之後，權利的保障是否還屬必要？」一般看法，認為民主政府既係政與民合一的制度，權利保障的繁文縟節似乎不必了。民主政府決不致損害人民的權利，因為這等於損害官吏自己的權利。今日的官吏即是明日的人民，在台上的時候不能不為在台下的時候着想的。小穆勒的意見沒有這樣樂觀。他相信政府真是民主了，權利的保障還是很重要的。無論那一個入嘗試到威權的滋味時總要表現出作威作福的身分，縱使明天就要變成平民，但今天的氣餒還是很可怕的。統治者總是統治者，除非能為人民的權利築一條堅固的城牆，民主的統治者也有不加重視的可能。小穆勒的先見是值得欽佩的，其後近一百年的政治演化史，證明所謂民主的政府，未必即能自動的尊重人民的權利。

我們所以引證小穆勒的話，無非說明政府對於人民自由總是具有危險性的。即使是真正民主的政府，也未能例外。我們現在還沒有真正的民主政府，自由自然更在危險狀態之中。而自由一旦發生危險以後，可能自由就愈來愈沒有保障，因為政府與人民，勢將各趨極端，使得自由的觀念，根本被破壞無餘。人民因自由受威脅，他們對於自由的要求必然更為積極。在通常的情形之中，一般人祇顧及身體的安全財產的完全，換句話說，祇要一人對於生活的打算能順利地實現。對於其他的自由，他們可說是不感興趣的。可是這種最低限度的自由被剝奪，他們不得不進一步要求言論及請願的自由，由是許多的行動，從政的眼光看來，更為動搖了政府的威信，因此要想出種種嚴厲的辦法來壓制所謂蠢動。這樣的循環刺激，一定是激烈的愈來愈激烈，壓制的愈來愈壓制，自由這個名詞，乃葬送於烏有之鄉。這是我們目前遇到的險境。

很多人說自由是個人主義的名詞，在集團主義的近代，不應當再拾出這個近於神學的名稱。這種觀點，即等於說真正的民主政府不致於損害個人的自由，小穆勒早已說出這個觀點的錯誤來了。集團往往由政府代表的，而政府則實際由官吏表現其行動。在保甲長可以牽走人家的羊捉走人家的雞的時代，在幾個士兵可以輪姦致死一個女教員的時代，說自由主義是自私的個人主義，那實在太不應該了。無論那一個集團，他的行動足以妨害個人的基本生存的時候，自由的要求總是不能漠視的。

現在，一切的事實證明自由的重要。不問是階級獨裁的蘇聯，議會民主的英美，以及什麼亦不是的中國，都未嘗能充分的授人民以自由。當然我們國家的情形可以說是最糟的。任何國家的官吏，決沒有我們的那樣專制與無理。一切國家的人民都還得為自己而努力，而我們則更應該努力加鞭。不然，我們各人生活上的打算恐怕不能有實現的一天。現狀不加改革，籠統的說我們的自由繼續受迫害，分析的說就是我們將繼續的生命不受重視，權益橫受摧殘，言論嚴受抑制，思想強被奴化。我們必須堅決的要求選舉的普遍實行，我們必須堅決的要求權利受法律的嚴格保障，我們一定得實現民主的兩個條件。

# 「官訓」

錢實甫

我們只看到一連串的「民訓」，却從沒有看見過「官訓」；這乃是民主政治之所以不能實現的根本原因之一。民訓自然是由官來訓民，原則上並不算錯，也不算壞，但却決不是準備製造順民或馴民。官訓並非訓練團所之類的以官訓官，而是指的以民來訓官。這話看來未免荒唐，其實則大有道理，以下我們慢慢去說。

孫中山先生把革命建國的過程分做三個階段：軍政、訓政、憲政，原本有其深意，未可厚非。但關於訓政這一個階段的作用，反對的人頗多，大致不外否認：黨員不一定個個優秀，足以訓人，而非黨員也不一定便盡不優秀，應該受訓。其實這並非中山先生的本意。他所說的以黨治國，不是以黨員治國，而是以黨義治國；訓政乃在訓練人民的政治知識與技能，決非單純的以黨員來訓練人民的統一思想。不過事實上，却弄得流弊百出，引起人民極大的反感。比如說，訓政時期原定六年，現在已經不只三年六年，訓政的成績何在？四權行使的訓練，本是訓政的中心工作，但直到三個月六年的今日，拿頭一個民權的選舉活動來說，許多地方，就還在用繩子綁着老百姓去投票。在人民的眼光中，選舉和徵兵徵糧徵工全無分別，一樣的都是義務，避之唯恐不及，根本上便不會慶幸這乃是一種權利的獲得。訓政的善意，成了一種變相的苛政，豈是中山先生的本心？而全國各級學校裏面所實施的黨化教育，尤其失敗，青年們頭腦中所反映出的，不外是另一種「八股」的反感和厭惡罷了。

無可諱言的，國民黨裏面確有一些所謂「頑固份子」存在，經常在破壞它自己的產業和榮譽。看到這種情形，不但不認為是一種失敗，反而還以為是「訓得不够」，硬要繼續去訓。現在政府已經改組，不久即可結束一黨執政的局面，實行還政於民。但我們却很就心：三黨或幾黨共裁的局面，是否一定比一黨獨裁為好？這到不是我們故意看不起政府，而是政府時常扮演出許多自嘲的場面來。比如在政府三令五申的頒布保護人民身體

自由的皇皇告示之後，接着便有北平的逮捕，上海的失蹤，以及種種和政政府命旗鼓相當的正面諷刺。假如我們的頭腦不太簡單的話，這種事實，當然要多少引起些懷疑來，決不能熟視無睹。今後的情形如何，還有待於事實的證明，我們不敢武斷它一定不好，却也不敢作太好的預測。

政府的這種缺點，對於人民固然是不利，其實對於政府的本身尤其不利。政府如果要得着人民的擁護和信仰，訓民的責任即令不能放棄，受訓於民的誠意尤其要有忠實表現。所謂受訓於民，就是此地所說的「官訓」。

以民訓官，看起來似乎太無體統了，在下者怎能訓上？其實仔細想想，這決不足怪。一個民主國家，人民便是國家的主人，人民乃是最高級的團體，政府與官吏乃是人民的下屬。人民是政府的業主，是官吏的雇主，人民對政府和官吏，正是上級之對下屬，上級給下屬的一切指示，說它是訓，有何不可？官吏是人民的公僕，是給人民辦事的，如果不明主人的意志，事情又怎樣去辦？所以一個賢明的政府，即令在君主時代，尚且不忘採風問俗，訪求民隱，博納輿情，先求了解民間的疾苦與希望之後，再定施政方針。若在民主國家，則一般官吏，尤其要隨時向人民請示，才合他做一個公僕的身份。目前的情形完全相反，只是一味的以官訓民，而不容許以民訓官或受訓於民。這種情形，正是「官主政治」。

我們並不反對一切大小官吏的訓人民，却更贊成人民去訓大小官吏。凡屬一個正真有民主頭腦的官吏，一定樂於接受人民的訓，不以為侮，且以為快。中山先生說訓政的要旨在由官吏對那般「不知為主人，不敢為主人，不能為主人」的老百姓，訓導他們知做、敢做、能做國家的主人。主人而不能訓他的僕人，官吏而不聽人民的訓或反以為恥，天下那有這個道理？官而自以為高於老百姓，這只可以說是天下的共主，決非人民的公僕！訓政時期的官吏成績如何，就完全取決於他的老百姓是否對他知訓、敢

調、能調。他對人民的調，也只是以訓求調的意思。

現在的官吏不同，總是自視頗高，不同凡品，除了受上級的訓之外，便是對下去訓。每個紀念週，對他的部下訓。不獨指導工作，而且指導一切，從道德到人生，從讀書到辦事，似乎一經作宰、萬事皆通，人格學問都比他的部下高明起來，這豈非天大的笑話？至於對老百姓的態度，尤其是驕傲萬分，十足的擺出那副統治者的架子。上者好者，下有甚焉，於是保甲長之流，受到上層的訓之後，回去便找老百姓發發訓威。更有甚者，凡是身有一官半職的人，動輒便召集訓話。師長團長可以召集民衆訓話，廳長縣長更可以召集教員學生訓話。開會時沒有一切動議、討論、表決，只是由那位當然主席去訓話。一切集會裏面，照例有長官訓話一項。這些怪事，隨處皆然，總是老百姓倒霉。所可惜的，是老百姓太冥頑不靈了，越訓越糊塗起來。我曾經聽過不少的長官向他們的部下或子民訓話，說得頗爲出人意料之外。比如升旗典禮的精神訓話中，他要人民愛國，尊敬國旗，而以外國爲例的說：「英格蘭，蘇格蘭，和那個……那個甚麼蘭的國旗是三色的，英國人都很敬重」之類，豈不把老百姓越訓越糊塗起來。

這是風。這種風氣似乎不可長，應該改一改作風。中山先生說：人民是有權的，政府是有能的；我們老百姓，自然有權去訓那般官吏。

人民如果訓官，則政府必須首先保障人民的自由——言論自由以及身體自由。否則，訓辭被檢，訓者被捕，誰還敢於說話。一個賢明的政府，

# 林繼庸感慨話新疆

丁維棟

唯恐人民不說話，唯恐人民訓示得不周詳，決不會嫌人民說話，怕人民訓示。陳儀長官在台灣的政績如何，我不知道，暴動的不幸發生，大半的道理乃在不肯聽人說話。

現在的官僚們，最愛大談其四書五經，以此而挽回人心，安定社會，復興國家。不錯，孔孟的教條，頗有些道理，大可爲範。他說：「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做官的儘管做官好了，何必向人民當義務的教書匠，使人民被訓得肝腸寸斷？他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做官的縱有一身本領，大可以不必向人民賣弄，却應該明白人民的意思在那裏。他說：「爲政不在多言」。做官的努力做事好了，實在不必多說廢話。這是聖人的教條，做官的如果真正提倡讀經，首先便應該自己實行。

記得蔣主席曾經有過命令，禁止文武大小官吏編印自己的演講集，這確有道理。我們更希望蔣主席再下一個命令，除了禁止浪費紙張印刷以外，更須禁止浪費人民的時間去聽那些廢話。而且，還要來個命令，命令文武大小官吏去恭聽人民的意見，了解「民之所好，所惡」，再定甚麼計劃之類。

官吏聽人民的話，才是憲政。首先，便要讓人民能夠自由的說，痛快的說。訓辭不被檢，訓者不被捕，人民才敢於說話，官吏才有所遵循。今後是「民主政治」抑「官主政治」，則要看政府的作風，究竟讓誰來訓誰，

## 三千里邊境

勝利以來，中國在北方的交涉中得到一個痛苦的經驗：神聖的條約一錢不值，強權政治依然是支配一切。在這種心理背景之下，外蒙軍在紅星飛掩護之下突入國境六百里，使人生第二個「九一八」之感。林繼庸先生過去在新疆替國家出過一番力，也因之吃過一番苦，談起天山南北的種種形勢，尤其是感慨無窮。

「中蘇在西北接壤三千里，其間有許多處由於邊省政情的特殊，沒有清楚的劃界；有的地方僅僅是一塊所謂界碑，戍守無人。在過去幾十年內，強鄰的意志隨時可使疆界南移。例如他們對於阿爾泰山的苗有興趣，

於是在若干時期後，阿爾泰山就不明不白的劃入了蘇聯的版圖。像新疆邊界上的霍城那裏，分界線是小河上的一頂小橋，南北並行的河流不止一條，於是小橋亦自動的逐漸南移，荒漠中許多水草肥沃可供耕種之區，一天的落到人家的手裏。」

「移民問題使我們西北的邊界增加流動性和不安定。橫跨在邊境上的有蒙古哈薩維吾韃靼等民族，蘇聯境內也有，新疆境內也有，他們有血統的聯繫，不是一個薄薄的分界線所能分開的。而且有的時候，可能一個家族分居兩國境內，彼此來往是不斷的。集團的大移民也時時發生，例如在蘇德大戰期內，蘇境配給制度嚴，人民生活苦，他們就移居到新疆來就食，反之如新疆有水旱之災，年成不佳，新疆的游牧民族一樣的大隊的馳出國境，解決生活問題，這種民族的高度流動性，是世界其他部份所少見的。」

### 政治上的失策

胡適之先生會希望中蘇邊境像美加邊境一樣的平靜無事，親蘇的華萊士先生亦有同樣的理想；可惜這些理想在今天看來很像是夢想。林繼庸先生說：「就是這些高度的集團移民，容易使弱的一方受到損害。在新省境內的各種族，老年中年人是愛護中國的，他們信仰回教，而回教是最保守的，蘇聯的無神論他們決不會接受，共產主義得不到他們的好感。但老的一代是如此，少的一代是不同了。這些好動的少年大都到蘇聯土耳其留學，到過麥加和埃及，所以有了世界眼光，懂得比較各國的政治和社會。如果他們不滿現狀的話，就會有人勸他們開創一個新的局面。」

「不過，所謂新局面的創造，還是要等機會的。在盛世才時代，新疆是被特務的恐怖支配着，人人唯恐因過失而送命，政治上的效率反而很高。以貪污而論，除了盛世才本人和家庭是例外，其餘的官吏都是戰戰兢兢，不敢作貪污之想。可痛心的是盛世才下台，中央直接統治新省之後，政治上的情形反而不如過去。舉一端而論，在三十二年四月之前，新疆的物價向來是全國最低的地區，有人在戰時譽之為世外桃源。中央接收之際，新省的物資很多，例如維爾我族的紳士貴族中，控制的物資就很多，物價本是不應該漲的。但是那時就有一部份派去的官吏，利用這個機會在新省大

量收買便宜貨，運到內地來發財。他們的「成績」是可觀的，在一年之後，新疆的物價甲於全國！人民不全懂政治，但切身利害的感覺是敏銳的，在生活逐漸困難的情形下，他們開始對現實不滿，再加上國際的策動，變亂因之而發生，一直延續到今日。」

「在政治上說，任命麥斯武德為新疆主席，是一個失策。要知道新省各族人民，受盛世才的毒害甚深。直接受害的估計有十五萬人，間接的達一百萬人，新疆的實際人口不足三百五十萬人，其中有三分之一皆欲得盛世才而甘心！他們希望中央將盛世才明正典刑，但是結果是完全失望，他們一口冤氣完全是吐在中央身上。在他們眼光之中，麥斯武德是中央的工具，一名道地的「回奸」，決不會加以擁護。同時新疆在亂動之中，麥氏沒有兵權，試問能說什麼，弄得不好的話，本身的安全都有問題！」

### 治本之道

「現在已經不是誰做省主席合宜的問題，而是中央對新應有建設性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安定民生。在盛世才時代，有許多剝削老百姓的辦法，一張羊皮，不論產在何處，一律要給省府收買，價目是一律五角！現在這種殘酷的剝削當然沒有了，但是是否有些所謂貿易公司在當地以低價收貨，還是值得調查的。如果廉能的官吏，推行健全的經濟政策，最能安定地方，增加各族人民對中央的向心力。」

「交通是值得注意的問題，現在關內和新疆，只僅一條甘新公路來聯繫。但是這條漫長的交通線，隨時可受蒙古或各族騾馬騎兵的切斷，記得在抗戰期間，哈薩克人的埋地雷，已是使旅客談虎色變了。為確保大西北的安全，我們久已主張所謂「複線走廊」的計劃。這是說要興建兩條鐵路，一條是從甘肅走廊出嘉峪關，直達迪化；另一條是從西寧出發，縱貫南疆，直達天山北路。兩線中間的地區，就是走廊。在這樣設施之下，關內外的交通方可確保，再不致被人切斷了。如果說是修鐵路工程浩大，緩不濟急，就應該集中一百架以上的飛機開闢航空線，亦不失是一個辦法。」

「在軍事和政治上，亦當有一番刷新。以軍事而論，可有計劃的增派軍隊到新疆。所謂有計劃，是指給養有辦法，而不是就地取給。否則以當地糧食之困難，兵多反而會引起其他的問題。同時，軍隊亦不能佔用民間

的水草地耕種，因為在新疆，水的爭奪可以造成流血。軍隊如何屯田，是一個頗值研究的課題。在政治上，新省各族之間，因利害不盡相同，亦是時時有糾紛，需要政府的調停。如果能以公正的立場，技巧的方法，調和各族的利益，對國家是絕對有利的。」

林氏談到新疆的前途，是十分憂慮的。「以這次白塔山事件而論，不足為奇，因為這類事件是年年都有的。不過從遠處看，某方政策的目標，無疑是要利用新省各族的離心力，造成「獨立」的狀態，時機一成熟，他們只要以新式武器供給各族，我們就很少辦法。迪化的某國總領事館，是

一個陰謀的大本營，各族的人要求改入該國國籍，是有求必允，他們今天說的話，到明天可以不算數。是標準的強盜作風，比日本人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果對新疆積極，也有可慮之處。想想東北的歷史，在張作霖時代，對日本採取退讓政策，沒有出什麼大事；到張漢卿時代，處處積極，葫蘆島築港，造南滿路的平行線，結果關東軍發急了，造成「九一八」的大變。如何維護西北主權，值得全國人士的思考。否則新疆有失，蘭州決守不住，寧夏亦將發生問題，西北的形勢將不堪設想了。」

## 為和平團結改革禦侮而呼籲

胡秋原

今晨翻開報紙，自本月五日起，外蒙軍隊一營配合蘇聯飛機四架，業已進攻深入新疆六百里之白塔山。我告訴朋友說，第二「九一八」至少第二「萬寶山」事件到了。就目前蘇蒙進攻之方式與規模看，當然還不是對

中國進行全面的鯨吞，而多半是要切斷甘新大道，先佔領整個北疆。然如新疆國軍將無歸路，整個新疆，將只是時間問題。蒙古完了，新疆再失去，東北的情形又復如是，整個西北華北將不堪設想了。這不僅是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也是全世界大亂的開始。政府與人民必須充分認識蒙新事變的嚴重性，共同挽救國家民族的危機。

稍為留心時局者，都可明白這次新疆事變不是偶然的。這是目前國際形勢下發生的禍亂；也是我們外交無謀，內政不修的惡果。

就國際外交而論，雅爾達密約，早伏今日事變之根。這且不談，可痛心的的是所謂中蘇友好條約，鑄成大錯。在這條約秘密談判之際，我和我的許多朋友由外國通訊社方面獲知條約內容。我們驚訝之餘，會夢想以個人努力，停止這條約的簽字。我們不贊成這條約，並非根據單純民族主義的理由。我們看出：這條約將惡化中蘇的友誼，這條約將增加中國的內爭，這條約將增加國際強權政治的鬥爭，這條約將使中國捲入國際霸權鬥爭之

漩渦中而不能自拔；而且，這條約決不足幫助我們收回東北，只足以使蘇聯在任何時期以外蒙為基地，向西北和新疆進攻——我們曾將這些理由向我們主持訂約的人陳述。然木已成舟；而勝利以來，一切禍亂無不由此而出。

然不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中蘇條約之所以發生，一半由于中國的內爭。而這一條約，又進而刺激了中國的內爭。抗戰中愚蠢與不負責任的財政經濟政策（特別是統制政策和低薪政策），早使整個政治機構朽腐糜爛，並增加了中國的離心和分裂。勝利以後，在朝的和在野的都不為整個國家打算，內爭與腐敗日烈。政治協商會議，曾與國家一線光明。我會說應該反對中蘇條約，然應該贊成政治協商。因為對外堅強對內和協，是千古為政的道理。而也唯有對內和協，始能對外堅強。縱使中共與蘇聯淵源深厚，亦不礙此真理。不幸政治協商會議終於失敗了。失敗的責任，我想一半是要中國朝野負的，而另一半則是中蘇條約要負的。因為政協決議之遺產，首先發生於東北接收之發生故障，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從此內爭日激，民生日慘，國力日衰，而中國的國際地位亦日落。荷印暹羅的橋樑不是常受迫害，法國飛機不是也到中國掃射嗎？旅順大連的接收，不是早成問題嗎？然政府諸公仍無根本覺悟，只是因循粉飾，甚至預預如故，腐敗如故。今日舉國切望和平。我們深知，此刻現在，中共之無意和平，或較政府

為尤甚。然如政府盡其在我，以百分之百的決心謀取和平，尚非不可為。我可以為許多從事和平運動的朋友一言者，大家渴望和平，不僅由於生靈塗炭，也是看出有人虎視眈眈了。這一次政府改組應該是給人民以希望的一個最後機會了。然這改組是如此之不徹底，無論政策方面人事方面並未面目一新。於是經濟風潮發生，學生風潮發生。老實說，這次學潮背景謂之為不滿現狀則可，謂之為中共煽動只是為中共誇張。而政府之張皇與若干官吏之顛覆，益使人心分崩離析，內爭方酣，人心離異之際，新疆事變便發生了。

而當前不幸的國際局勢，遠者不論，莫斯科會議之失敗，以及杜魯門主義之宣布，自使蘇聯認為是應在遠東下手之時。莫斯科會議失敗消息傳來，我曾經寫信給政府中人，說東北或新疆必出大事，且多半由外蒙出面。當蘇聯在歐洲業已如願以償，對土耳其也許暫停前進，在朝鮮已與美國「獲得協議」之時，則向最弱之處發展，在強權的羅網，可說是可能而必要之步驟了。

## 二

今天國難當頭，首當其衝者，是政府，我們自不能不向政府鄭重忠告，望能充分反省。老實說，今天政府實在已到天怒人怨的境地。而人民依然容忍者，並非有所留戀，而是深知這一政府沒有了，即是中共之完全統制中國，人民亦非對中共有何成見，所懼者，經中共之手，淪於異族耳。即此一點，政府仍大有可為。然如政府無改于今日之道，亦決不足以免於覆巢左任之禍。這實在是每一個愛國的人今日腐心憂慮，而無可如何的。如今政府諸君縱不為國家計，亦當為自身計。一個政府不僅要有謀國之公忠，而且要有謀國之知識。國家到了這步田地，多年在政治上負責的人，如果還不自知責任，不自知不足，那還有什麼希望？國家到了這步田地，人民應該容忍政府，政府也應該容忍人民。今天大難當前，一切愛國的人無有不擁護主席的。然政府諸君必有共赴國難之誠意，澈底由中央到地方充分擴大政府基礎，在維護國家獨立的大前提下，網羅一切開明進步自由民主的人物，共同担負國家的憂危，並根據國家當前的需要，重新考慮我們所有外交經濟內政的政策。千萬不要以為情形愈危險，對內愈控制。我

們並且以為政府應不躊躇的接受參政會和平方案，對中共再作和平呼籲。無論結果如何，政府應盡其在我。須知對內寬容，才能對外禦侮。這是根本的根本。古往今來，未有內政不修，而不受侮於外者！

有此決心，才能談到應付此次事變的方針。以今天之百孔千瘡，自非大言可以了事。我們自不必擴大事變，但我必須忠告政府，千萬不可真正認為是一地方事件，喪權畏事，含糊了事。我們今日必須有一沈痛認識，中國必須避免一個國際戰爭，甚至永遠避免一個國際戰爭，然倘無不惜一戰之決心，亦決不能避戰。因此，政府除了照例的抗議之外，必須一面集中可能兵力從事抗戰；一面將此次事變，向聯合國提出緊急申訴，並作一切最惡劣之準備。至於在西北各地，對於吏治以及民族政策，必立即有迅速和根本的改革。再不能因循，再不能作不公的打算了。

## 三

我們不能不向中共呼籲。我們希望中共在此事變之時，為國家和自身的前途考慮正當的政策。我們首先希望中共勿以新疆事變為可以幸災樂禍之事，或是軍事進攻的良機。我們決不說中共不應反對政府。老實說，沒有反對黨，政治是不會清明的。而在今天中國情形下，我們也不說中共不應以武力反對政府，雖然這是極不幸的事情。然而，我們不能不說，在中共武裝作戰到東北以後，中共在國人心目之中，恐怕是所得不償所失的。而現在東北，居然有日本人蒙古人韓國共產黨為中共助戰了，這是什麼事情！於今蘇聯與外蒙進攻新疆了，這決不是中共加強進攻的時期，而是中共應該考慮和平的時期。

我們能够了解中共對於蘇聯的觀念（這觀念我們不願批評）。我們也能相信中共與蘇聯的關係，是精神的，而物質的少，而中共之有今日，主要得力於自身之奮鬥。蘇聯對於中共，是一後盾還是一負累，尚很難說。然我們也願中共了解，今日新疆事變，不是蘇蒙與政府的問題，而是蘇蒙侵略整個中國的問題。中共可以與政府為敵，然不能與中國為敵。中國人民誠不滿於政府，但這與歡迎中共尚有區別，而與歡迎蘇蒙進攻更有區別！中共如在此時策應蘇蒙，只足以使人民寧可忍痛接受本國的惡政，抵抗中共和蘇蒙。換言之，這只是鞏固中國政府中的反動與腐敗的傾向，只



足以使中共為中國人民所不齒。沒有一個政黨能不考慮國民的心理。無論蘇聯在中共心目中如何神聖，然在蘇聯進攻中國之時，中共不能與蘇聯站在一條線上。不幸如此，中國如不亡，中共必不為中國人民所容忍。而中國如亡，則屆時中共諸君的地位，亦不過較波蘭政府略勝一籌而已，這還值得奮鬥嗎？

因此，今天應該是中共考慮和平的時期。

四

# 不許日人重到台灣

(台灣通訊)

(上)

憶琴

最後我們願向全國人士一言，特別向自由民主人士一言。國家的內戰，使民主改革和建設不可能。我們必須促成和平的實現。於今和平未得，國家又遭逢不可知的大變了。我們站在國家的立場上，唯有一致起來對外表示中國民族獨立不容侵犯的決心。同時，我們必須要求政府和中共立即無條件恢復和談並停止衝突。同時，我們必須以一致的輿論和有組織的努力，要求政治經濟軍事的全盤改革，來挽救國家的危亡。時危事急，國家是大家的，我們不能坐視了，也無法沈默了！

(六月十一日)

前些日子看到報載日本提出在台灣有移民特權的要求，使我聯想到日本人在台灣的所作所為，以及他們的陰謀與野心。這裏，筆者只是十分客觀的拉雜寫些事實，也許可以使讀者獲得一些粗略的印象：如果我們不用智慧與實力去排擊日本人的狂妄企圖，一任日本大量移民至台，則今後的台灣將成怎樣一個世界。

我到台灣的時候，日本人還沒有被遣送返日。台北市區，台灣人和日本人是分區而居的。大致在太平町一帶，是台灣人的商業區，在西門町一帶，則是日本人的商業區。其他如大正町、幸町、東門町一帶都是高等住宅區，自然都是日本人的勢力。所以在那個時候，只要你到日本人的商業區或住宅區一帶走走，你就恍惚到了日本本土，一片的木屐聲，刺激着你的耳鼓；不用說，看到的是花花綠綠的和服，聽到的是吉里括拉的日語。

日本人在台灣整整的住了五十年，在這片殖民地地上已做了五十年主人，作威作福，壓榨剝削，個個弄得腦滿腸肥，生活享受遠超過他們本土的同胞。要他們離開台灣，實是一椿受不了的事情。從精神方面講，日本人在台灣的，至少有二三十年的歷史；有些生長在台灣日本人，更把台灣

當作他們的家鄉，台灣是他們熟悉的土地，對於足跡未至的日本本土，他們倒反而生疏反而茫然。無論日本人的性格如何野蠻粗暴，這一點對於住久了的土地之依戀，他們總還是有的。

單是精神方面的依戀還比較抽象，容易擺脫；不幸的是還有物質上的利害關係，使日本人捨不得離開台灣。多少日本人到這塊美麗的島上來，依靠他們「統治階級」的特權，白手起家，發財致富。他們的全部財產在台灣，他們的全部心血在台灣，有的甚至他們的全部親戚朋友在台灣。離開了台灣，回到他們的本國，他們就立刻從富翁的地位落入赤貧的階級，這一種滋味，用常情猜度，自然是不容易消受的，縱使他們的政府能够救濟收容，但他們知道日本戰後的匱乏，遠勝於台灣，決沒有像台灣這樣的舒適生活可過。更何況日本人的眼光最現實，度量最狹窄，要他們拋棄這筆因侵略得來的「橫財」，如何捨得？

所以，有一位台灣省的高級官員曾告訴我這樣一段故事：他說，當他在南京參加日本向我國簽訂降約典禮的時候，曾遇到日本駐台軍的參謀長諫山春樹，諫山對他提出請求，希望我國政府能够對台灣的日人採取寬大政策，容許他們繼續留居台灣。諫山說：「日本人在台灣一定絕對奉公守

法，做着良好的公民，要是必須的話，在台灣的日本人甚至願意取得中國國籍，永為中國國民。」諫山又說：「就連日本駐台的軍人，也願解甲歸田，永住台灣。」諫山的後一句話值得回味，雖然他懇求時的態度頗為誠摯，然而你知道他的矮肚皮裏裝的什麼鬼計？那位高級官員給他的回答是：「一切聽候我國最高當局的決策。」諫山默然而退。

三十五年二月間，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與美方魏德邁將軍協議結果，中央的決策下來了。台灣省的日俘日僑，一律限期遣送返日。這個命令，不僅台灣的日本人相顧失色，而且一度曾在台灣行政技術上，亦引起了相當的焦慮。

因為日本統治台灣採取最殘酷的殖民地方法，在台灣未光復以前，日本和台灣人是絕對的不平等的。日本人在台灣推行的六年國民強迫義務教育，引起一般人盲目的稱道，殊不知這種教育只在使台灣人略識之無，不致過分愚昧到一點不能做日人當做工具運用而已。進一步比較高級的教育，台灣人無法接受。進中學已是難事，進專科就難上加難；至於進台灣的日本帝大，那是比登天還難了。這種教育統制的結果，使台灣人變成了最底級的工具，供日人驅使利用。那時候，成千成萬的中小學教員及大學教授，幾乎都是日本人。政府機關的中上級官員，公司礦廠裏的中上級職員，也都是日本人。台灣人，只配充雇員，做工役，做下女。只有少數御用紳士的弟子，可以接受比較高級的教育，充當比較高級的職員，為虎作倀，幫着日本人來壓榨自己的同胞，而從中漁利。

在這種環境之下，立刻要把幾乎是全數的日籍公教人員遣送返日，這大量的人員如何補充？中國其他各省一時也召集不出如許的公教人員去台服務，而台籍低級公務人員的知能已被日本的愚民教育所限，不能頂替；即使頂替了，也決難勝任愉快。在當時，從行政技術上來說，這一脫節現象，實是足以引起大混亂的危機。

但是雖然有這樣嚴重的困難，政府權衡輕利害，還是不顧一切的把日本人遣送走了。台灣是中國的土地，我們無論如何應該自己設法來管理，決不能永遠征用日人來執行政令，復興建設。遣送日人是必做的工作，無論有多大犧牲，多大代價，却應徹底的執行。

和全國其他各地一樣，台灣遣送日俘日僑也是中美合作的。除了必須

留用的少數日籍技術人員及其家屬以外，五六十萬日本人在三十五年四月以前完全遣送完畢，這一工作，做得敏捷，徹底而圓滿；那些奉命分批遣返的日人，也想不到他們之離開台灣，竟是如此的迫促，不容遲疑。

在日僑被遣時我曾到台北車站去旁觀，有一天正是大雨滂沱，雨點至少有手指那末粗，那雨勢真當得起「如注」兩個字，我遠望着大隊日本人緩緩的走來，他們是被遣返的一個分隊。有一個中年男子充任分隊長，他手裏握着一面寫了隊名的白布旗，帶着呢帽，沒打傘也沒穿雨衣，淋着雨一步一步的向前領導。後面跟着一隊人，男子大都不打傘，女子打着傘，揹着孩子，牽着孩子，一步一步的走。孩子們拉着母親的或姊姊的手，他們的小腳穿着木屐，雨水幾乎打濕了他們的全身，雨太大，大人們的傘保護不了孩子的衣服。這後面是人力車，人力車裏是老年人以及簡單的行李。

街的兩旁有的是避雨的走廊，然而這一隊行列却走在街的中心，冒着雨緩緩前進。沒有一個人想躲到走廊裏去，沒有一個人想走得快一點。他們默默地一步一步的走近車站來，我則一陣一陣的打着寒噤，「多可怕的民族呵！我們今天趕走了他們，如果我們自己不爭氣，他們是會冒着大雨又這樣一步一步的走回來的呀！」我邊打寒噤邊這樣想。

日本人是想回台灣的，據有些台灣朋友告訴我，離台的日本人竟致荒謬到對他們說，「再隔二十年，我們再見吧！」當時，這是一種耳語，令人疑信參半，而現在，日本竟正式式的提出特別移民權來了，這是何等居心？

倘使日本竟獲得了在台灣的特別移民權，今後的台灣會成怎樣一個場面，我們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毫無問題，被遣送返日的那五六十萬日本人，必然全數回到台灣來，也許還帶着他們貧困而在本土無法生活的親友，都到台灣來淘金。台灣，他們是熟透的土地。在從前，他們以統治者的面目出現，自然不會博得台灣人民的好感。這一次如果重來他們必換一付和善的偽面目，展開極端不利於中國與台灣的工作。

（待續）

### 徵稿簡約

- 一、本刊稿件除請專家特約撰述外，並歡迎外界投稿。舉凡經濟政治問題之探討，專題之研究介紹，翻譯及文藝通訊等作品，均所歡迎。
- 二、來稿字數請勿超過五千字，其有特殊價值者，不在此限。
- 三、來稿請用語體文或通俗文言，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
- 四、譯稿須附原文或註明出處。
- 五、筆名由作者自擇，惟稿未須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地址。
- 六、凡經本刊登載之稿件，非經允許，不得另在他處發表。
- 七、本刊編者對全部稿件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需時，概不退還，其附足郵票者不在此限。
- 九、來稿一經刊載，當比照一般稿費標準，從優致酬。
- 十、來稿請寄上海四川北路麥拿里三十一號本社。

### 民主論壇週刊 第一卷 第七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出版

本期實價每冊二千元

編輯及發行者 民主論壇社

上海四川北路麥拿里三十一號  
電話：(〇二)六〇五六二

上海總經售處 聯合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中保坊二一五號

南京總經售處 中外書局

太平路八一號之一

印刷者 文明書局印刷所

上海西康路三三七弄九〇號  
電話：三七三五〇

本刊登記手續尚在辦理中

# 聚興誠銀行

便利人羣 服務社會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並由國家指定定經營外匯

有卅餘年歷史

◀ 通匯地點 ▶

上海 南京 廣州 香港 北平 天津 漢口 沙市 宜昌 昆明 貴陽  
長沙 常德 成都 重慶 萬縣 宜賓 樂山 瀘縣 遂寧 內江 自流井

# 中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專營進出口業務

附設：機器廠——供應各式機件  
麵粉廠——供應麵粉

地址：四川南路一號三樓

電話：2878

重慶美豐大樓四十六號

天津中正路一百卅七號

電報掛號 0195 或 Shanghai Chung yu

外國分公司：紐約 香港  
外國代表：倫敦 印度

# 義豐錢莊

營業項目

一 存款 二 放款 三 匯兌 四 貼現 五 代理 六 押匯 七 其他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交款迅速 手續簡便

信用鞏固 利息優厚

上海分莊：

地址：南波路二二三號  
電話：九三九三三號  
電報掛號：二一三三號

重慶總莊：  
地址：陝西路二三八號  
電話：四一五二號  
電報掛號：四四一六號

# 建業銀行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上海分行 上海天津路二〇一號  
電報掛號 九七三八  
電話 九七二五〇 九二七七四  
九二八二一 九四五九三

總管理處 上海東體育會路模範村二一號  
電報掛號 七三八七  
電話 (〇二) 六二〇五七

重慶分行 重慶民族路一一七號  
電報掛號 六二二八

成都分行 成都湖廣館街四八號  
電報掛號 一〇八三

長沙分行 長沙中正路一四號  
電報掛號 七二三〇